

新历史主义崛起的文化史释析

朱 静

(河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的激进政治的熔炉,批评家意识到批评必须致力于具有政治和历史意识的学术研究,而 20 世纪 60 年代末左派在政治上失败后,撤退到学术界,通过颠覆学术的手段继续战斗。同时,学术自身发展对变革的要求,同学者自身性别、阶级、种族等的多元化一起,带来了学界的“重新划界”。而现实世界对历史的遗忘,则促使新历史主义者在研究中对历史进行补偿性的拥抱。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化史;激进政治;左派;变革

中图分类号: I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6378(2014)01-0083-05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的一开始就发出这样的呼吁:“始终历史化!”^[1]这意味着,我们在考察新历史主义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崛起时,除了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它的智性资源之外,还要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它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之间复杂的相互关联。新历史主义的任务之一,是恢复所有写作中的“文化具体性与社会根植性”,即便这种复原不可避免地会是不完全的,也是从我们自身历史、社会和体制所塑造的立场出发的^[2]。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界在讨论新历史主义本身的时候,却往往忽略其“文化具体性与社会根植性”。大部分论者,热衷于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探讨,而较少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理解它为何出现并风靡美国学术界。因此,围绕新历史主义在学术界的发展的讨论,往往是“非历史的”。而本文要做的,就是对新历史主义运动进行历史化的理解,追踪推动它崛起的社会时代语境。即从文化史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从当前的视角来给它一个定位。

—

20 世纪 60 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

代,也是 80 年代崛起的新历史主义者上大学或刚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越战、妇女运动、学生运动、民权运动等等,所有这些都在这群“60 年代的孩子”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文学研究领域从 80 年代初期开始的“重新定位”,大部分是这些价值观形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化试验和政治动乱中的批评家——“获得了教职的激进分子”——的功劳^{[3]392}。因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首的意识形态政治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 60 年代的遗产。

在经历动荡之前的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中期,美国大学校园与外界的重大问题和事件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南方的民权运动、女性主义的狂热几乎没有在校园中激起什么波澜。学生专注于自己的个人事业,教师关注问题的学术意义而不是社会意义。这时的大学,可谓名副其实的“象牙塔”。这个中的原因之一是,二战结束之后,由于《退伍军人权利法》,即 *G. I. Bill* 的施行,美国大学校园里充斥着退伍军人。他们都已成年,有的甚至是拖家带口在完成大学学业^{[4]86}。一方面,这些人心智比较成熟,另一方面,经过战争的他们尤其渴望平静,因此,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校园都趋于平静和保守。

但是,平静很快被打破。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

收稿日期:2013-11-10

基金项目: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研究》(11YJC752042)

作者简介:朱静(1975—),女,四川荣县人,文学博士,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比较文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当代西方文论,新历史主义。

的越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事件、城市暴动等,促使大学生变得热心政治;左翼及反战团体空前活跃,发传单、组织抗议,政治标语随处可见。校园中静坐、游行、示威不断,学生与校方冲突频繁。学生运动爆发的一个原因是,这一时期的学生数量激增。此时在校的,正是第一拨“婴儿潮”中出生的年轻人:1946年美国大学在校生大概有2百万,而到了1970年,已经变成了8百万。这一代的学生在自由和民主的教育下长大,真心渴望社会公平^[5]。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此时正值服兵役的年纪,而越战的惨烈通过电视影像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厌恶而又惧怕战争,因而反战情绪高涨^[6]。血气方刚的年纪,加上对前途的忧虑,很容易被挑动起来。

伴随着学生的政治活动的,是对学术改革的要求。朱利斯·盖特曼(Julius Getman)在《与学者同行》(*In the Company of Scholar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Higher Education*, 1992)一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学生的激进政治如何在后来演变为学术的过程。盖特曼把这些要求总结为3个方面:1、相关性,即要求课程应该面对社会的重大问题:战争、征兵、民权运动、女性主义及各种社会不公。不仅如此,还要求教师在教授这些主题时,不要一味保持学术距离,而要有政治关注。2、学生权力,即要求在学术管理方面,学生要有与教师同等的权力参与进来。3、反精英主义,即摒弃优雅的话语、写作和外表,更加直接、开放和平等^{[7]130-131}。于是,当一代致力于推翻学术等级、抗拒理论化和不屑学术研究的人,在80年代开始进入体制,成为教授时,就开始为学术研究带来极大的变化。他们延续了观察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左翼视角和对具体问题的特殊兴趣,天真地以为,对一个问题在学术上进行充分的理解,就等于在真实世界处理了这个问题。他们在期刊大量发表对时事的学术分析,把“学术写作”同“解决问题”混淆^{[7]160}。

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的外部斗争转向了内在的斗争。当这些“20世纪60年代的孩子”进入学术界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需要赢得前辈学者的首肯而获得教职;另一方面,又要坚持自己的理念。于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似乎只能是把抗议学术化,即用学术的方式攻击现存体制,而这些攻击又可以成为

获得教职的资本。他们把激进思想转化为学术理论,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得到教职的之前的激进分子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把话语视为通向社会变化的道路。另外,那些获得学术成功的人,要么否认、要么理性化自己从中获得地位的快感。因此,“平等价值”与“成为精英的满足感”之间的冲突,在他们身上上演得最为激烈。而这种内在冲突的结果是,有些人更猛烈地抨击体制,即使他们从中获得了好处;有些人则避讳成功;还有一些人改变了观点。更多的人则是在虚伪与学术上的激进主义之间走钢丝。尽管如此,这些获得教职的激进分子对学术界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们提醒我们,学者有义务面对时代的问题^[7]。

二

如果说盖特曼向我们讲述的,是整整一代人的故事,那么具体到新历史主义本身,又有其特殊的关注点。在新历史主义崛起之前,许多文学研究者对诸如权力和意识形态之类的问题是相当抗拒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问题却成为了一种时尚。究其原因,韦恩的观点与盖特曼类似,认为新历史主义者对之前批评传统的拒斥和对文艺复兴社会权力问题的聚焦,与当时的学者和批评家所处的历史时刻有着深刻的关联。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熔炉塑造了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体制性权威和权力中的各种职位。这一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开始致力于摧毁一个多世纪以来都相对稳定的那些文化公理,“女性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及福柯主义者,都在质疑那种传统的本体论、道德和意识形态基础”,而结构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则“摧毁了它的认识论基础”。而造成近来文学批评话语理论上争议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20世纪60年代政治上的“大无畏”。大多数传统的学术领域都打上了20世纪60年代那一代人的不可磨灭的印记^{[8]56-57}。因此,“与其庆幸我们比前代的莎士比亚学者更能阐明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权力运作,倒不如审视我们学科中那些可能是广泛揭示我们时代权力的一部分的条件。”^{[8]59}

根据韦恩的说法,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存在揭示权力的两个方面。首先,是始于20世纪60

年代的批判性、去神秘化或祛魅活动。这些活动造成了不可撤销的变化,使文化和社会的某些方面比过去更开放(主要是专业职位对妇女和少数民族裔的开放)。其次,是权力的公开展示。当时,公司对人的生活质量的控制不断延伸,美国外交政策实行里根/兰博式的冒险主义,一些当选官员和原教旨主义传道士则在努力逆转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成果,保守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在教育领域呼吁课程“改革”时,公然叫嚣遏制和压迫的主题。一个是揭示权力,另一个是展示权力。这两种倾向看似相反,但韦恩却认为它们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是当前美国社会同一普遍现象的矛和盾的两面。因而,新历史主义对莎士比亚的社会中权力的迷恋是一个“反射性的手段”,新历史主义者通过它来协调自身具体的社会背景中的权力关系。

科恩则通过对过去几十年美国批评的简单勾勒来澄清新历史主义崛起之时的处境。20世纪50年代,上层阶级具化成麦卡锡主义的反共产主义进攻,依赖这种进攻,新批评在文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带来的理论真空与20世纪60年代的危机的结合,引发了何种批评将接替学术界的问题。而答案便是理论。但由于大学的活动分子在当时还太年轻,还不足以产生一个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最初还不是一种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政治的理论,而是由保罗·得·曼(Paul de Man)发展的解构批评,成为20世纪70年代的中心运动。20世纪60年代大学的扩张和校园政治激进主义,让学术组织和文学课程向新的兴趣开放;而20世纪60年代的那一代人渐渐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于是,年轻一代解构批评家开始关注政治。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解构还只是一种结合了激进的哲学研究和对政治关注的矛盾心态的理论立场,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右派在里根政府的得势,让激进者感到了不安。这一境况的结果就是,“政治获得了一种20世纪70年代所缺少的紧迫性。”^{[9]18-19}

与韦恩一样,科恩也认为,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权力的关注可以在当下的语境中得到合理的解释。他说道:“新历史主义简单地把莎士比亚视为皇权的代表,如果这在文艺复兴背景下难以成立,那么在现时的背景下却可以得到合理解释。”^{[9]36}这一立场的社会基础是:美国政府对印支

农民进行的大规模屠杀、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战运动无法达成任何目标、20世纪80年代的右翼势力反弹。因此,新历史主义应该被视为一种“左派幻灭的形式”。从这一角度,新历史主义对“新大陆”帝国主义的强调,对政权的持久关注,以及这些激进批评中那种奇怪的“寂静主义”,就都能得到解释了^{[9]36-37}。

综上所述,也许可以这样说,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政治的熔炉,批评家意识到批评必须致力于具有政治和历史意识的学术研究,而20世纪60年代末左派在政治上失败后,撤退到学术界,可以通过其它颠覆性的手段继续战斗。但是,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批评与20世纪60年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却很少有论者进行深度探讨。这主要与右派对政治批评的攻击有关。托马斯曾指出,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将注意力放到国内事务上,尤其是毒品和教育的问题上。毒品的泛滥,在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是同教育没能把西方文化遗产中体现的价值传承下去联系在一起^[10]。于是,从1987年艾伦·布鲁姆(Allen Bloom)的《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开始,就一直有一股潜流将西方文明的堕落归咎于法国理论。布鲁姆就曾为20世纪60年代康奈尔大学把古老的核心课程交到一个比较文学教授的手中而惋惜。在他看来,这名教授正是巴黎最新时尚的勤勉的进口者^[11]。与布鲁姆一样,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在《获得教职的激进分子》(*Tenured Radicals*)中写道:昨天的激进学生变成了今天的教授或系主任。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校园遍布着政治鼓动家。与1968年大学校园中充斥着暴力反抗的情形相比,现在的学术界显得极为安静。但是,如果说这几年我们已经成功地把本科生转移到了右翼,那些受聘把我们文明的伟大著作与思想介绍给学生的男男女女却大都还忠实于60年代的解放主义意识形态^{[12]7}。

丁奈什·德苏扎(Dinesh D'Souza)在1991年的《非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中也宣称:“老一代传统的文学教授逐渐退休,让位给新一代60年代思想哺育大的教授。”^[13]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新历史主义并不是当前唯一的颠覆性运动,而是更具广泛的威胁的一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到90年代初,开始出现一

种反思大学和学术界的潮流。金博尔说,从传统的角度看,各种政治色彩强烈的学术研究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就是摧毁传统人文研究的价值、方法和目的^{[12]1}。

三

以上是基于历史意识的解释,强调社会文化的大语境与学术界更为具体的行为之间存在反应的连续性。而在这之外,大卫·辛普森(David Simpson)还提供了一种基于文化生产理论的解释。这种解释强调的是学术界亚文化的断裂性和自主性。他认为,学术界对历史的回归不是对更大的历史运动的反应,而仅仅是对学术界“要求变化”的反应。在他看来,在新历史主义崛起之前的20多年中,否定或避免任何对被成为“历史”的东西的可靠使用,成为一件很时髦的事;解构和相对主义变成了独裁者而不是叛逆。因此,作为一个自身要求激进变化的专业,文学研究必须寻找一种新的能量源。于是,“突然之间,在批评行为中展示自我意识变得性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成为一种时髦,只要你不通过对大学财产的‘错误行为’坚持实践与宣称之间太紧密的关系”^{[12]722}。不过,在辛普森看来,历史派的对立面不但没有被击溃,甚至都没有从思想上觉得不安。英语系没有被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或新历史主义者占领,当然也没有被少数派占领。说这些人已经占领了英语系,更多地是一种说辞而不是实际的情况^[14]。

除了学术自身发展对变革的要求之外,文学研究领域在80年代的变化还有一个人口学上的因素。从GI Bill开始,大学里学生的组成逐渐变得多元,一些不同性别、民族、宗教、阶级、政治倾向或性取向的人进入学术界^{[4]118-148},文化和意识形态传统由于他们的参与而变得复杂。蒙特罗斯认为,被排他和他者的经历激发了他们对主流文化的补偿性拥抱,一种被接受和同化的欲望,但同时也激发了反抗或斗争的态度。这些分化和不和谐的立场为“如何对待经典文本”,尤其是“为文学研究的组成种类和标准程序的挪用和批判”提供了有利视角。因此,在他们从事的专业中,他们开始质问正典研究(Canonical study)的相关性,质问使作品成为正典的智性和政治传统。“职业开放”

的结果之一,便是蒙特罗斯所言的“重新划界”:重新划定那些传统上把一个学科与另一个学科分开的疆界,以及对跨学科实践的兴趣^{[3]393}。

新历史主义的崛起还可以通过学者自身学术生活的现实来加以解释。一方面,可以把“新”的诱惑以及对“新”的生产解释为体制的要求;另一方面,新历史主义对体制力量的强调,还是因为文学学者,尤其是女性主义者、少数族裔和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体制塑造的压迫性力量”,而他们恰恰又是这一体制的一部分。再者,一些历史主义者强调读者、编者、作者在作为社会产物的文学文本的最终创造中的影响,这其实反映了学者本人“花费在与同事、外面的读者、期刊编辑、著作编者以及涉及在出版过程中的其他人的交流互动上的时间。”^{[15]7-8}

最后,新历史主义的崛起还可以在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得到解释。如蒙特罗斯所说,新历史主义是一种“补偿”,是对我们加速遗忘历史的补偿。而对历史的遗忘,似乎是一个“越来越技术化和面向未来的学术界和社会的特征。”^{[3]394}或者,我们可以把新历史主义的崛起看做对当代作家和艺术家对历史的关注的一种回应。因为现代戏剧,从布莱希特到莎福尔(Sir Peter Levin Shaffer)和布兰顿(Howard John Brenton),都探讨历史主题;而诸如品钦(Thomas Ruggles Pynchon, Jr.)、德利洛(Don DeLillo)、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和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等的后现代小说,也深刻地涉及历史;后现代建筑引用历史风格;甚至极简音乐都借鉴历史^{[15]8}。不过,现代文化之所以如此深刻地投入历史,正是因为其对历史的遗忘,历史主义因而成为一种补偿。

以上这些关于“回归历史”的论述,其实正是验证了新历史主义的信条:文化产品的创造(包括学术著作)根植于各种复杂、相互交叉的过去,一部概念上可分而实际上相互连接的历史。也就是说,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将会与新历史主义提供的关于过去文化时期的各种历史一样复杂和多样,而本文提供的是其中一种基于文化史的考察。做这样的追踪的必要性在于,它不仅加深我们对新历史主义本身的理解,而且能在更广义的层面上让我们审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领域

[参 考 文 献]

- [1] JAMESON, FREDRIC.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9.
- [2] MONTROSE, LOUIS A. "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 [C]//H. Aram Veaser. *The New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89:20.
- [3] MONTROSE, LOUIS A. "New Historicisms," [C]// Stephen Greenblatt and Giles Gunn.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 [4] ALTSCHULER, GLENN C, STUART M BLUMIN. *GI Bill: The New Deal for Veterans* [M]. C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09.
- [5] FISCHER, KLAUS P. *America in White, Black, and Gray: The Stormy 1960s* [M].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6:252.
- [6] MANDELBAUM, MICHAEL. *Vietnam: The Television War* [J]. *Daedalus — Print Culture and Video Culture*, 1982, 111(4): 157—169.
- [7] GETMAN, JULIUS. *In the Company of Scholar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Higher Education* [M]. 1s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160.
- [8] WAYNE, DON E. *Power, politics, and the Shakespearean text: recent criticism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C]//Shakespeare Reproduced: the Text in History and Ideology Jean E. Howard and Marion F. O'Connor. New York: Methuen, 1987, reprinted in 2005 by Routledge.
- [9] COHEN, WALTER. "Political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 [C]//Shakespeare Reproduced.
- [10] THOMAS, BROOK.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 — Fashioned Topic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vii.
- [11] BLOOM, ALLEN. *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320.
- [12] KIMBALL, ROGER.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M]. 3rd. Chicago: Ivan R. Dee, 1995.
- [13] D'SOUZA, DINESH. *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172.
- [14] SIMPSON, DAVID.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Return to 'History'* [J]. *Critical Inquiry* (Summer), 1988 (14):723.
- [15] COX, JEFFREY N, LARRY J REYNOLDS. *New Historical Literary Study* [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8.

【责任编辑 王雅坤】

A Cultural History of New Historicism

ZHU J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radicalism of 1960s, critics realize that academic study should be politically and historically committed. So the leftists continue their subversion in academia when they failed in the real world. In the meantime, the demand for change from academia, together with the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class, racial and sexual identities of the critics, accelerate the redrawing of boundaries in literary study. Last but not least, the historicist investment in modern culture can be seen as a compensation for our oblivion of history.

Key words: New Historicism; cultural history; radical politics; leftist; change